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治理研究

穆光宗 余利明 杨越忠

【摘要】 文章通过对全国关爱女孩试点县重庆彭水和云南会泽两个国家级贫困县与地处发达地区浙江省绍兴市的调研比较,分析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基本阶段、特征和经验模式,试图探索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内在规律。文章提出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三阶段假说,并在调研基础上总结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基本机制、方向和工作框架。

【关键词】 出生人口性别比 性别偏好 关爱女孩 性别公正

【作者】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余利明 浙江省绍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越忠 浙江省绍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偏高问题就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特别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发表以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升高更是成为国内外人口学家聚焦的热点问题之一。大约10年前学界就已经注意到:目前的人口问题已不单纯是生多生少的生育增量问题,而是生男生女的性别偏好问题(陈俊杰、穆光宗,1996;穆光宗、陈俊杰,1996;莫丽霞,2005)。1998年,以“婚育新风进万家”项目为载体的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活动以试点方式启动(陈胜利,2000)。2003年3月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陆续在全国24个县开展了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现已扩展到32个县,而且各地也在省的范围内开展综合治理试点工作(全国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成效初现。

在结构性人口问题时代拉开帷幕之际,“改善人口结构,保障人口安全”成为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价值取向。在已往的研究中,揭示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和挑战的居多,成果丰硕,认识深入。本文旨在总结中国各地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上所取得的经验。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治理的内在机制和阶段划分做出判断与分析,然后总结成功的经验模式并提出综合治理的思路。

一、关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治理阶段和特征的两大判断

数据表明,自1982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处在失调中攀升、攀升中加剧的状态。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分析,本文得出了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总体恶化,局部改善。从现有数据来看,中国人口生态的恶化失衡现象颇似某些年度自然生态的失衡。在笔者的理解中,“人口生态”是指人口的性别和年龄标识所产生的差异性,以及男女老少互补互助所支持的人口发展格局。根据联合国早年提出的一个标准,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处在102~107的范围里,这可以视之为一个“大数定律”。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结构生态明显偏离正常值域(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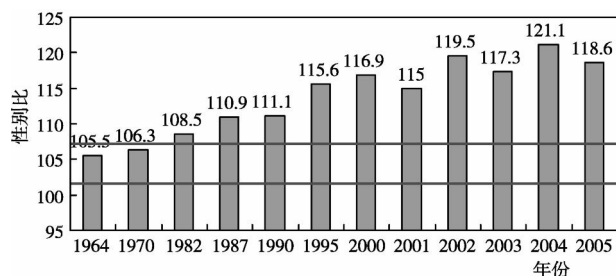


图1 1964~200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注: (1) 图中两条横线内的范围表示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域。(2)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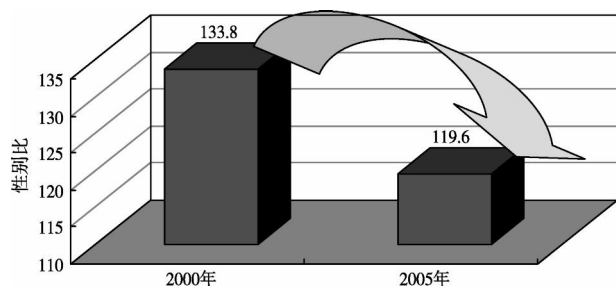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05年试点县出生人口性别比

注: 图中数据为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提供的全国关爱女孩试点县监测网点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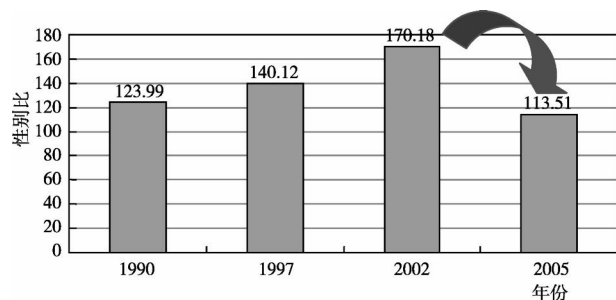


图3 1990~2005年重庆市彭水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情况

注: 图中数据由重庆市彭水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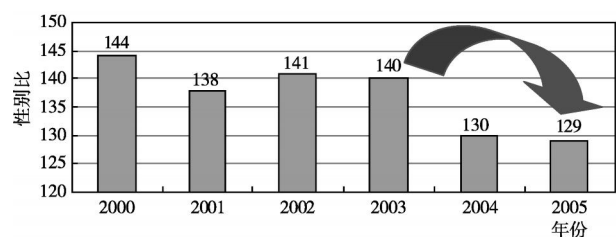


图4 2000~2005年云南省会泽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情况

注: 图中数据由云南省会泽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从区域变化看,近几年来,中国部分地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取得了进展(见图2~4)。无论从全国关爱女孩试点县监测网点数据来看,还是笔者2006年5~6月去全国试点县的重庆市彭水县、云南省会泽县和发达的浙江省绍兴市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资料看,全国关爱女孩试点县均取得了成效。在全国“总体恶化”的形势下取得了“局部改善”的成绩。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依然在高位运行,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笔者调研发现,只要措施、方法得当,贫困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治理效果是可以预期的。彭水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从1981年开始偏离正常值,以后逐年攀升,1990年为124,1997年为140,2002年为170。2004年,彭水县被确定为全国“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县。到2005年,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为113.51。如果该县所反映情况属实,对其他贫困地区将有示范意义。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也是在2004年成为全国试点县。会泽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恶劣的生存条件导致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但近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势头有所缓和。

两个贫困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严格细致、责任到位的管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优惠性政策出台前后计划生育女儿户的生存境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产生了示范效应。但必须承认,目前的治理所获得的还只是表层的变化,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贫困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反弹的潜在趋势是存在的。

第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治理总体上还处在遏止阶段。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角度说,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大致可分为遏止、缓冲、正常3个阶段。统计数据同样是102~107即可

能反映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正常”。“统计正常”包括了“外生正常”和“内生正常”。或者说“统计正常”包含了两种含义。用公式表示为:统计正常 = 外生正常 + 内生正常。

“外生正常”或者说“表面正常”反映的只是统计数据的正常,其实还存在内在的冲突(行为约束与性别歧视的冲突),所以是靠外部约束形成的正常。“内生正常”反映的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生成机理的正常,不仅统计正常,而且是在男女平等的观念下自发形成的正常。在一些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局部正常”只是“统计正常”。至于“统计”本身是否正常,还没有什么依据可以判断,还是一个“谜”。在经济不够发达、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地区即便出现了暂时的“统计正常”,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可能离稳定的“内生正常”还有很大距离。而经济文化发达,性别比正常持续(如浙江省绍兴市),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问题属于不同性质。与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重灾区比较,东部发达地区的绍兴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已至少有 10 年之久。从数据看,1994 年绍兴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2,1995 年降到 107.3,此后一直处于正常范围内。

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遏止阶段”(也就是全国目前的阶段特征),统计正常反映的实质是:外生正常 > 内生正常。虽然全国部分地区在遏止中有所下降,但总体上还处于行为控制和外部约束阶段,性别歧视问题远未绝迹,离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稳定还有很大距离。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综合治理处在遏止和反复遏止的对抗性拉锯式的发展阶段。

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缓冲阶段”,统计正常反映的实质是:内生正常 > 外生正常(表面正常)。

在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正常阶段”,统计正常反映的实质就是无性别歧视条件下的“内生正常”,即:(内生正常 - 100) > (外生正常 - 100)。

我们对未来的愿景是内生正常最大化,外生正常最小化(见图 6)。图 6 也可看做是有关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阶段和特征的理论诠释。

第一阶段为遏止阶段,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统计数据表现也不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还处在对 B 超等行为的外部约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B 超等行为社会控制与强烈的偏好男孩意愿驱动下的反控制行为之间的对峙和冲突。

第二阶段为缓冲阶段,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统计数据开始表现出向正常值域回归的趋势,内生正常逐步壮大,甚至表现出外生统计正常,但性别歧视仍未绝迹。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一方面对超生意愿和 B 超等行为有强有力的抑制,统计数据有回归正常的迹象;另一方面在观念和态度层面上还没有消除重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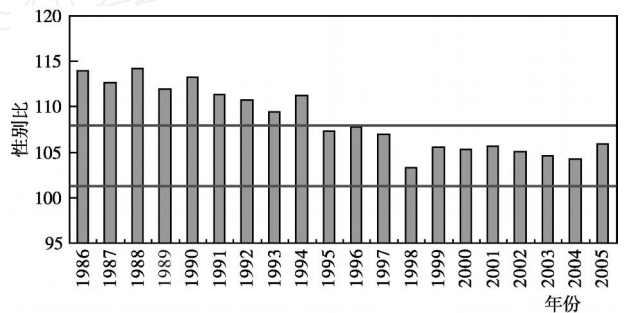


图 5 1986 ~ 2005 年绍兴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情况

注:(1)图中两条横线内的范围表示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值域。(2)数据由浙江省绍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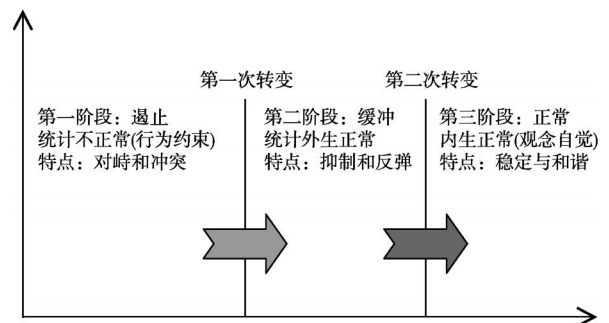


图 6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三阶段假说

轻女、男尊女卑,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还存在反弹的潜势。

第三阶段为正常阶段,不仅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统计数据表现正常,而且这一统计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其内在的形成机理也正常,即“外生正常”和“内生正常”同步,名实相符。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无歧视性性别偏好、观念自觉下的稳定与和谐。

从理论上推断,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第一次转变就是从“统计不正常”到“统计外生正常”,而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第二次转变则是从“统计外生正常”到“观念内生正常”。简单说,第一次转变是行为约束和控制的成功,第二次转变才是真正深层次的观念转变与自觉的成功。我们真正期待的是第二次转变,但事物发展的逻辑是从第一次转变开始。

以 2006 年 6 月我们对绍兴的调查为例,绍兴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全面进入“统计正常”阶段,应该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事。总体来看,1986~1992 年和 1994 年绍兴市出现统计失常,但平均数背后存在着区域差异。一些(县)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波动”特征提醒我们绍兴市在前几年所出现的“统计正常”还具有外生性特点。如 1991~1997 年,诸暨(县)市摇摆在“正常”与“失常”之间。1986~1997 年,新昌县、嵊州(县)市和诸暨(县)市依次成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区。从分孩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来分析,也能一窥“外生正常”的端倪。绍兴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出随胎次升高而升高的变化趋势,如 1994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2,其中一孩出生性别比为 107.7,二孩出生性别比为 122.3,三孩出生性别比为 118.4。作为发达地区的绍兴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治理和演进还若显若隐地带有“外生正常”的特征,更不必说全国的情况了。

二、发达地区“歧视性性别偏好”的消亡

众所周知,性别歧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原因,B 超技术只是为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人工中止妊娠提供了方便(穆光宗,1995)。所以,深入了解生育观念的转变对于我们把握出生人口性别比内在平衡机制很有帮助。

某种意义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今天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明天,因此剖析成熟的个案和经验模式很有必要。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绍兴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趋向正常,而且表现出时间上的持续性,这似乎暗示着绍兴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演变已经进入了“内生正常”的发展阶段。但从“外生正常”到“内生正常”的演变这个时刻如何判定呢?

有理由认为,进入 21 世纪,绍兴市育龄人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进入“内生正常”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根据 2003 年绍兴市生殖健康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计算,绍兴市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是 1.58。也就是说,绍兴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已接近学界通常认为的政策生育水平,接近国际上认可的超低生育水平。从表可以看出,要 1~2 个孩子的妇女占调查人数的 97% 以上。其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比例最大,为 54.33%,比希望有一个孩子的妇女高出 11 个百分点。

表 2003 年绍兴市育龄妇女对理想子女数的偏好

	不要孩子	要一孩	要二孩	要三孩及以上
育龄妇女人数	27	2504	3149	116
百分比	0.47	43.20	54.33	2.00

注:表中数据由浙江省绍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性别偏好是关键性因素。绍兴市的数据表明,超过 40% 的被调查妇女不存在对生育性别的主观偏好。其中,在只希望生育 1 个孩子的妇女中,无性别偏好的比例高达 65.38%。男孩偏好比

例(19.81%)略高于女孩偏好(14.82%)。也就是说,“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的想法在只要一个

孩子的家庭中占了主流。上虞市温饱解决略有余钱的家庭多,受到当地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对教育投资普遍重视,要将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去读书,而家庭的经济剩余只能承担一个孩子的教育投入。根据上虞市放弃生育的调查,近年积累了可以生育但还没有生育的一女户 1.6 万,其中 5 000 户已成为奖励对象,肯定不生,另 1/3 孩子已大,可能不生;还有 1/3 年纪还轻,可能生育。每年大概有 500 户进入推迟和放弃的对象队伍之中。近十多年,上虞市总和生育率一直在 1~1.2 之间,最低到过 1。每年出生的一孩率大约为 77%~78%。独生子女家庭在计划生育家庭中占 67%,有上升的趋势。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家庭生了一个男孩,如果再生,害怕再生男孩。“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没有市场。

更有意思的是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妇女的生育偏好(见图 7)。调查显示,“男女平等,阴阳互补”的“好”理念占了主流,比例高达 75.2%。在多数人眼里,中国文化中的“好”字就是由子和女共同组合而成的,所以,男女固然平等与男女的确不同,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大多数人所表现出的“性别偏好”实际上是一种“性别平衡”意识。加上真正不在乎性别的 20.60%,没有性别偏好的人群比例达 95.81%。而希望生两个女孩的比例还略高于希望生两个男孩的比例。

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两种性别偏好,即歧视性性别偏好和非歧视性性别偏好(冯占联,1994;穆光宗,1995;谭克俭,2005)。从 2003 年生殖健康调查数据推断,有歧视性性别偏好的人为数甚少。例如,嵊州市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累计有 2.1 万双农一女户夫妇放弃二胎生育。已婚育龄妇女 17 万人,有 2.1 万人超过 4 年生育间隔没有提出二孩生育需求,也没有生育的妇女。其中部分领取独生子女证;部分孩子还小,没有领证;还有孩子已超过 14 周岁,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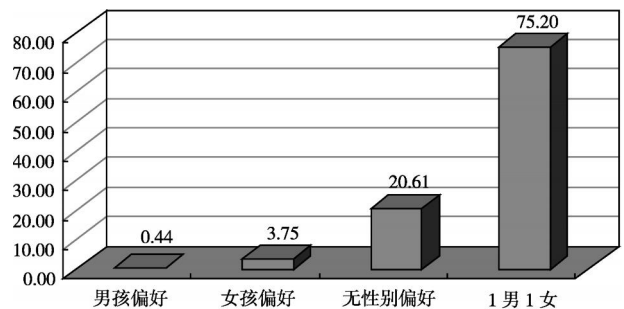


图 7 绍兴市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的性别偏好

注:图中数据由浙江省绍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直没有领证。2004~2006 年,绍兴全市主动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超过 2 万人。

在绍兴这样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生育孩子的需求主要是出于亲情需求和风险规避。绍兴市一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孩夫妇达 68.70%,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达 26 万对,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开始凸显。据绍兴市人口计生委 2005 年统计,全市未婚的独生子女严重伤残的家庭为 621 户,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为 422 户,未成年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严重伤残家庭为 1 913 户,父母死亡的为 2 684 户(魏鹏程、何伟平,2007)。群众在座谈时谈到:“一个孩子抚养成本高,两个孩子成本也差不多,有些成本可以下降。一个孩子比较孤单,风险较大。”例如,2001 年统计,诸暨市孩子夭折还没有再生的有 100 多个独生子女家庭。除了不能生育,一般会再生育或领养。很多独生子女家庭提前 20 年进入了“空巢”期。一些家庭还是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男孩女孩无所谓。诸暨市计划外生育人数已从最低年份 1999 年的 212 人,增加到 2000 年的 889 人,2004、2005 和 2006 年为 642 人、641 人和 634 人,从其超生的意愿看,突出表现为“穷的穷生——养儿以防老”、“富的想超生——育儿以继承”和“再婚要硬生——以孩子维系感情”等现象。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绍兴市的经验给我们的启发是:“发展是最好的平衡器”。为

什么绍兴人对男孩的偏好大大弱化了?这与妇女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很大关系。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绍兴市形成了以发达的轻纺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经济形态向智力劳动为主的知识经济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形态转型。

绍兴市的经济状况是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基础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绍兴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绍兴县、诸暨市、上虞市和新昌市均为全国百强县市。绍兴市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工业化起步较早,城镇化水平较高,第二产业发达。2005年第二产业占绍兴市GDP总量的61.01%,而同期农业生产总值仅占GDP总量的6.56%,第二产业中的轻纺类工业,包括纺织业、服装和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化学纤维制造业等尤其发达,成为绍兴市第一支柱产业。绍兴市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民营为主的所有制结构源源不断地吸纳女性就业。绍兴农村妇女就业门路广,就业渠道多。在非农化、工商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和有利于性别平等的就业结构大大淡化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将社会性别公正纳入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中,这是绍兴市一大特色。

绍兴市有大小领带企业2000余家,5万多从业人员中女性占80%。我们在嵊州市长乐镇与当地育龄妇女座谈中了解到,很多妇女都在当地民营的电机厂做工。越剧艺术产业也是以女性为主。100多个民间职业越剧团为3000多名女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就业岗位。绍兴农村还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有为数不少的家庭妻子在当地工厂里打工,丈夫在家种地。

经济文化发达的上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正常,当地领导反映从来没有听说过“非生一个男孩不可”的说法。上虞市地处杭州湾,交通便利,开放早,群众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见识多。上虞市是著名的建筑之乡,有10万建筑大军,经济比较发达,2004年,位列全国百强县第42位。2005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1699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7760元。女性农民很少,产业结构调整对女性思想影响很深。

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收入的提高可能激发人们对男孩继承家业、传宗接代、光耀祖先的需求,但从长远看社会发展会促进性别平等。绍兴市发展了方便或者倾斜于女性就业的产业,的确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遏止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大有帮助。绍兴市女企业家多,女性地位高,无形中产生影响。不少人认为,两个女儿比一个儿子还强;相比之下,女儿还孝顺和贴心些。妇女地位与女性受教育状况关系密切。近年来,绍兴市女孩平等的受教育权得到充分保障。2003年,绍兴市初中毛入学率,女生为99.25%,男生为99.10%;2004年女生为99.98%,男生为99.94%,较好地实现了教育公正公平的目标。绍兴市的情况表明,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之中是消除性别歧视最具冲击性的力量。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治理的经验模式和思路

本文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治理的基本思路表述如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区域合作,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综合治理”。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是“行为约束”和“观念引导”,二者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在理论上,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治理需标本兼治。所谓“标”是指行为约束,所谓“本”是指观念引导。行为约束和观念引导是互相制约的过程,行为上的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旧的观念,同时观念上的引导也会改变歧视女婴的行为。但比较看,观念引导更基本。如果说行为约束是外生控制,那么观念引导是内生控制。

首先,在行为约束的表层,各地的做法主要是打击“两非”。根据安徽省等地打击“两非”的

经验,B超问题大致可分为:“职务之便”型、“非法行医”型、“流动隐蔽”型和“团伙操作”型等。毋庸讳言,打击“两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改变已出现问题的性质,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人工中止妊娠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扰动作用已经产生。事后治理所发挥的直接效应是“罚一阻十,杀一儆百”,可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毫无疑问,更重要的是行为发生前的预防性控制。

例如,严格的B超管理制度是对行为的源头控制。为此要设法改变两种B超行为,即改变寻求B超鉴定的育龄人群的主体行为和B超操作者的服务行为。加强对主体行为和服务行为两种B超行为的预防性控制是更初级的控制,未雨绸缪,效果更好。

预防性控制需要相应的环境支持和制度安排。环境支持突出如“三定点”(定点孕检、定点接生、定点引产),实行定点单位引产和分娩、孕妇凭证引产和分娩制度。制度安排突出如管理区域内严格实施凭证建卡、凭证保健、凭证接生、凭证引产、凭证取环、凭证分娩制度。

治标措施主要是通过综合管理的办法在行为的层面上来约束B超选择性别行为、引产女胎行为、出于性别选择考虑的药物终止女胎妊娠行为。绍兴市建构的行为约束的综合治理框架如图8所示。

行为约束发挥的是“他律”作用,观念引导培育的是“自律”的力量。简单依靠控制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等方法并不是治理性别比失调的根本之策,实质是末端治理而非源头控制。通过宣传教育和观念更新,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是最大多数人在男女平等、性别公正方面的“文化自觉”,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在观念引导的深层,宣传主题需要明确突出社会性别意识、人口安全意识与政府责任和公民责任两个责任意识,即“以人为本,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关爱女孩,关心母亲;性别平衡,人人有责”,核心目标是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自然平衡,倡导生育文明,促进性别平等。

为此要把握好两个视角,一个是社会性别视角,另一个是生命周期视角。社会性别视角提倡的是“赋权女孩,性别平等”。生命周期视角关注的是“关爱女孩,关爱母亲”。女孩乃至整个女性人口群体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根本上是因为权利的贫困,权利的贫困导致了她们人生的失败和整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失败。所以,“关爱女孩”重在“赋权女孩”,而且要“公正赋权”。关爱女孩实质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努力的赋权、投资和保障女孩的过程。在历史框架里要体现国家对未来的责任,在家庭框架里要体现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在社会框架里要体现男性对女性的责任。并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点和有限的公共资源引向女孩权利被剥夺最严重的地区、人群和家庭,如传统生育文化、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影响深重的地区,歧视、不公正对待甚至虐待女性的人群,贫困、愚昧、破败困扰的家庭。关心一切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女性,关爱女孩从尊重女性开始,关爱女孩从关心母亲开始。

两性效用的差别与其说是因为“性别”,不如说是因为“赋权”。男女平等的核心是权利平等,而且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权利平等”概念。我们要在性别公正的旗帜下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公正赋权”是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的基本依据。具体说,关爱女孩最重要的是要在法律上赋予女孩平等的出生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特别是受教育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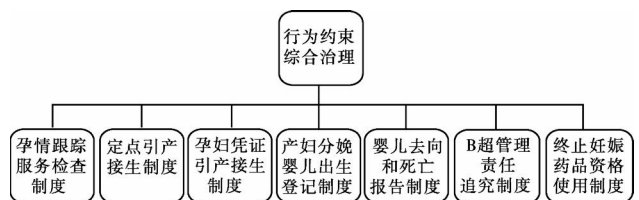


图8 绍兴市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行为约束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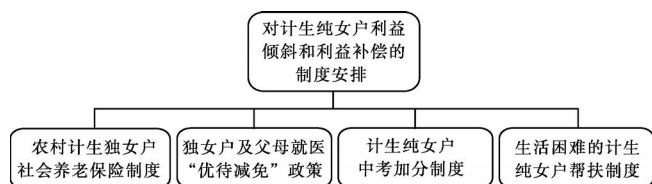


图9 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利益导向机制

体系(见图9)。

在工作路径上,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可遵循如下工作战略来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自然平衡。事实证明,如果说政府主导是力量之源,那么部门联动可成机制之效,社会参与凸显格局之大,而公民认同则见效果之好。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关爱女孩不等于溺爱女孩和偏爱女孩。所以,要坚持在社会性别平等的前提下开展关爱女孩活动,在正确的战略下把握好工作的方向、提高工作的力度和效度,努力实现四大结合:即为了孩子成才,实现少生、生女与优生优育的结合;为了家庭致富,实现少生、生女与脱贫致富的结合;为了老年保障,实现少生、生女与社会保障的结合;为了性别平等,实现少生、生女与倡导平等的结合。

参考文献:

1. 陈胜利(2000):《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致彭~云国务委员的一封信》,载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局:《中国生育文化论丛》(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文集之四)。
2. 莫丽霞主编(2005):《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后果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3. 穆光宗(1995):《近年来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的理论解释》,《人口与经济》,第1期。
4. 陈俊杰、穆光宗(1996):《农民的生育需求》,《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5. 穆光宗、陈俊杰(1996):《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人口研究》,第2期。
6. 全国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关爱女孩行动工作指南》,中国人口出版社。
7. 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别比课题组(2000):《治理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经验》。
8. 冯占联(1994):《出生性别比异常的非统计含义:一个社会学的解释》,“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9. 穆光宗(1995):《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的理论解释》,《人口与经济》,第1期。
10. 魏鹏程、何伟平(2007):《关于“和谐计生”建设的理论思考》,中国人口学会、浙江大学人口研究所“纪念马寅初‘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11. 重庆市彭水少数民族自治县(2006):《“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情况汇报》。
12. 绍兴市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2006):《绍兴市妇女发展规划(2001~2005年):终期监测评估报告》。
13.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2006):《“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情况汇报》。

(责任编辑:朱犁)

The Change in Dysfunctional Pregnant Outcomes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Population Health

Zheng Xiaoying and Others ·48 ·

Based on data of surveys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1988, 1997 and 2001,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ing trend of dysfunctional pregnant outcomes and the regional variation and age variation of the outcomes. The results show an increase tendency of dysfunctional pregnancy's propor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birth ratio of dysfunctional pregnancy of the low age cohort (15 ~ 24) and the high age cohort (35 ~ 49) tend to b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iddle age cohort (25 ~ 34), and the birth ratios of dysfunctional pregnant outcomes in all the age cohorts have a growing tendency. Analysis of regions'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GDP figures indicates different mod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nd Rural Residents' Medical Security

Chen Zaiyu Kuai Xuguang ·55 ·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 in 2004,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on rural residents' security to explai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Two decision making models for rural residents' choi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nd medical expenditures are constr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asants with best and worst health in self-evaluation are not willing to join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ndicating the system encounters adverse selection and the ability to disperse the risk of medical services is much lower.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model suggests that the probability and quantity of medical expenditure for rural residents depend mainly on the severity of illness and are not affected by enrolling in the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the membership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has not provided enough medical security.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and Career Expectat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Han Yixiang Weng Jie Zhou Biyu ·63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human capital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on their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and career expect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human capital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ir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and career expectations. College students with more human capital stock plan their careers earlier. Although these students wish to work in big cities, they don't hope to enter labor market too early. Upgrading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students families will weaken their employment intension. Students in better off families not only raise positive claims for selecting careers and jobsites, but also expect for higher salarie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college students' current employment decision-making and career expectations not only reinforce labor market dualistic structure, but also enlarge social inequality by intergeneration transmission.

The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Wage :The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Ding Yuan ·72 ·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wa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the Cointegration approach, and builds the model of VAR to conduct the 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luctuation of labour productiv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shock itself, and this shock has a large intensity and a long-term effect on the fluctuation of average wage in different ownership units, which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effect of the mutual shocks among average wages.

Research on Handling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in China :Stag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Prospects

Mu Guangzong Yu Liming Yang Yuezhong ·81 ·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on "Pilots of Caring for Girls" in Pengshui County of Chongqing, Huize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and Shaoxin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stage,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mechanism and prospects of controlling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and explores the regularity of governing population sex ratio issu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stage assumption for controlling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and summarizes the mechanics, prospects and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governing Sex Ratio Unbalance at birth in China.

Spatial Distribution Analysis on Sex Ratio at Birth in Shandong Province

Zhang Kun Zhang Songlin ·89 ·

Based on birth data at county's lev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distribution of SRB in 1982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technique of Local indicator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was employed to detect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ing. The findings are facilitative to policy making in the "Care for Girls" campaign conducted since 2003 and aimed to reduce the SRB. This paper claims that selecting "hot spots" in LISA analysis as experiment counties and cities may lead to better results in the "caring for girls" campaign.